



20世纪 中国史学编年 (1900~1949)

上册

A Chronicle of Historiography in
20th Century China

王学典 主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山东大学 985 工程二期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团队项目

20 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1900 ~ 1949)

上册

王学典 主编

陈峰 姜萌 编撰



创于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 ~ 1949/王学典主编;陈峰,
姜萌编撰.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 - 7 - 100 - 10691 - 7

I. ①2… II. ①王… ②陈… ③姜… III. ①史学史 - 中国 -
20 世纪 IV. ①K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0695 号



20 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 ~ 1949)

王学典 主编

陈峰 姜萌 编撰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0691 - 7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10 × 1000 1/16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63 ¼

定价:256.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言

呈现在学界面前的这部书稿,动议于2002年春,着手于2005年9月,撰写过程迄今已历十数年。这样一项工作竟耗去如此久的光阴,实在出乎当年的想象之外。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以为两年、顶多三年即可结束此项工作。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感觉前50年的中国史学,基本上已有定评,尘埃落定,而后50年的中国史学,则是笔者的专攻所在,许多东西虽然是非未定,但文献相对比较熟悉。鉴于上述两端,所以就产生了一种能尽快结束战斗的乐观预期。

谁知工作一旦展开,困难即接踵而至,小到一系列细节的考订,大到一部著作学术史意义的估定,无不颇费周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可以说是对我们十多年来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撰写编年,当然首先要求对史学文献和史学事件做出时间上的定位,而不少文献事实上已很难查找,有的甚至已渺无踪影,也有太多的史学事件被辗转误传。对这些非常模糊乃至以讹传讹的文献或者事件的精确化考订,耗费了我们巨量的心血,乃至让我们苦不堪言。例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一部划时代名著的初版时间,就存在着多种说法,其中,《郭沫若年谱》的说法是1930年3月20日,我们遍检文献,根据其最早版本确定是在1930年1月20日。再如,李泽厚关于20世纪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论断广为流传,但这一论断究竟出在何处,众人均语焉不详。我们查阅了大量书刊,最后才发现这一说法最早出自1994年6月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刊登的一封信不起眼的李泽厚致编辑部的信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之所以会面对如此多的困难,原因在于,这项工作基本上是前无所承,几乎是白手起家,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从基础做起,任何一个环节都不敢懈怠,因为这是一部工具书、资料书,“准确无误”自然是基本要求。我们不能为追求进度而牺牲准确

性,而是需要一种蚂蚁搬家般的耐心和毅力。这样,工作就只好年复一年的推延下来,十余年的光阴就这样消耗在一条条材料的考订、整理、斟酌中。其间,编撰团队大小会议开了数十次,逐字逐句通稿不下五次,许多条目不知修改推敲了多少遍,仍不令人满意。其中之艰苦,实难与外人道也。中间有几次甚至想中止这项工作。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我们用十余年的时间坚持做完这部史学编年呢?

笔者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喜读学者年谱和历史编年,以为它们比传记和普通的历史叙述更有趣、更全面,甚至更有意义。年谱和编年的最大价值在于能容纳空间的存在。而普通历史写作的一大问题,是历史叙述的强大内在逻辑,迫使叙述者把空间时间化了,牺牲了空间的共存性,成就了时间的一维性。历史的本质是变迁,变迁的参照是所谓时间,而时间的本质则是事物或现象的先后次序,所以历史写作就只好迁就时间的要求。花开数朵,但只能一枝接着一枝表,无法在语言上同时呈现,这样就出现了先后问题。历史写作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历史叙述几乎都牺牲了空间的存在。在笔者看来,唯有年谱、编年、年表等体裁,可以静态地同时兼顾时间与空间,可以呈现同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多样化甚至是多元化的事实存在,——至少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事实的存在。尤其是,20 世纪的历史学是过渡形态的历史学,过渡形态的历史学复杂多变,可谓新旧参半,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编年这种体裁恰好可以同时容纳这些不同的事实。

推动我们用十数年的力量做编年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20 世纪中国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而言,“20 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纪,不是 3 世纪、5 世纪,也不是 17、18 世纪,它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从世纪之初梁启超《新史学》对以往中国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全面清算开始,中国现代史学从无到有,全面铺开,不断深入,曲折推进。也正是从此开始,以往的史学全部被归并到“传统史学”的范畴,而此后的史学则全部被纳入到“现代史学”概念之中。不管此后的历史延伸多久,——不管延伸 30 世纪还是 40 世纪,人们都会把 20 世纪的历史学作为自身的起点,而把此前的历史学当作自己的“史前史”,或仅仅当作史料使用。从形式到内容,从思想到观念,从语言到体裁,从侧重叙事到专题研究,“传统史学”和“现代史学”,已无法放置在同一个范型内予以考虑了。相对于以往的历史学,“中国现代史学”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是一次新的日出。所以,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就具有特殊的分水岭的意义,而研究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学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在我们看来,紧跟 20 世纪的脚步,撰写一部翔实的编年,无疑是推进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如同前面所说,这部编年从发凡起例,到条目甄选,从材料收集,到细节核实,几乎均前无所凭。开山辟莽,前驱先路,是撰写这部编年给我们的最大感受。万事开头难!实际上,最难的,还不是“开头”本身,而是如何坚持“客观性”这一治史原则。为了这一原则,我们不知付出了多少精力。对前50年的历史学界来说,这一原则坚持起来问题不大,甚至对后50年的“前17年”来说,问题也不算太大,最难斟酌的是“文革”后的20多年,其中,世纪末的最后10年尤甚。其故在于:第一,这10年论著之多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遍览不易,究竟选择哪些论著入编,确难把握;第二,离当下太近,没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沉淀,许多论著的价值是无法即时作出判断的;第三,作者与此一时期的许多研究者均为同辈人,这更增添了格外的难度。为了克服上述困难,我们已尽最大努力:尽最大努力去收集资料、考订史实和细节;尽最大努力克服“偏见”和局限,追求“客观”和全面,尤其是关注易被忽略和被掩盖的东西。其中,最为我们所倾力的,是那些具有创始、开拓、突破和有标志性意义的论著。“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毕竟是我们编撰这部编年的基本宗旨。

主观上的追求是一回事,但客观上能或已做到什么程度,则有待学界的检阅和时间的审查。令撰者感到欣慰的是,读过本部编年初稿的学者们均给予这项工作以较高评价。出于审慎和郑重,我们于2012年将编年稿本送呈12位学者审读,这12位学者来自不同研究领域,既有世界史又有中国史,既有史学理论,又有具体学科,既有专门史,又有断代史,而且这12位学者多是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我们恳请这12位专家既审读与各自专业相关部分,又通审全部稿本,而审读的重点在于:有无重大遗漏?评估是否准确?体例完善与否?最后这12位专家均就和自己的专长相关部分和全部编年,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态度之认真令人感动。之后,我们的编年团队又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来研究落实专家们提出的修改增删意见,最后才形成现在的面貌。所以,本书不折不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笔者在这里感谢这些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专家。这些专家在提出建议和看法的同时,顺便也表达了对整部编年的鼓励和赞赏,认为“有功学林”,“厥功甚伟”,“学术意义重大”,还认为编年“不仅具有文献学的价值,更具有学术史尤其是学术史入门与导读的作用”,甚至预言本部编年“将是年轻一代学子们的必读书”,等等,等等。我们深知,这只是专家们对我们这些劳作者的慰劳之语而已,但我们也深为这批最早读者的积极反响所鼓舞!

事实上,来自学界的鼓励之声,并不始自这12位专家,这项工作从一着手,我们便得到了朋友们的鼓励。笔者从这些鼓励声中得出一个结论:当“新史学”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行程之后,无论是史学史研究的从业人员还是

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对“历史学回顾”或“世纪盘点”抱有极大兴趣和渴望,而一部翔实的 20 世纪史学编年,将会给这种“回顾”和“盘点”的进行提供基本的凭借。这大概就是朋友们对这部编年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我们由此找到了支撑我们这项工作的意义,我们所付出的心血也将因此获得足够补偿。当下的中国史学界(确实)需要这样一部世纪编年!而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者又何尝不需要自己的专业编年?我们感到,至少以下三类编年需尽早着手:一是断代史编年,如先秦史研究编年,秦汉史研究编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编年,隋唐史研究编年,宋辽金元史研究编年,明清史研究编年等;二是专门史编年,如考古研究编年,经济史研究编年,思想史研究编年,文化史研究编年,经学史研究编年,政治史研究编年等;三是专题编年,如孔子研究编年,《论语》研究编年,《史记》研究编年,《汉书》研究编年,甲骨文研究编年,乃至儒学史研究编年,道教史研究编年,佛教史研究编年等等。相信这些编年不仅具有学术史回顾的价值,更具有指引当下相关研究方向的作用。历史研究者不仅要指导社会,他自己也同样需要自己历史的指引。而只有当这些编年出现之后,一部翔实丰满的 20 世纪史学编年才可以预期。至于我们这部编年稿本,表面上是得风气之先,实质上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由于 20 世纪中国史学文献卷帙浩繁,如恒河沙数,此书篇幅虽巨,仍难以均衡地照顾历史学科内部的方方面面,舛误之处想必所在多有。限于学力及识见,难免会漏收少量具有一定学术史价值的作品,留下遗珠之憾;同时,也可能会有不该收录而予收录的现象发生,给人以鱼目混珠之感。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我们最感惶恐的。另外,书中对于若干作品和史事的评价判断也不无可议之处。这里补充说明一点,本部编年从编纂构想到体例制订,从框架设计到具体作品的评价口径,特别是对那些敏感时段敏感作品的把握和去取,均是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由笔者来进行和决断的。因此,本书若有这方面的问题,应由笔者来负责,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诚恳期待着来自学界和读者的批评。

王学典

一、本书以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事和重要论著为主,凡与史学变化发展有关之文化、政治、社会等重大事件也酌予辑录。

二、本书所指“史学”,乃一外延较广之称谓,与今日通行的“史学”概念存在出入,而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学”重合,大体囊括文、史、哲诸领域,文学和哲学方面主要侧重于重大的哲学史和文学史研究活动。盖因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渡状态,在西方学科体系的影响下,旧有的史学形态面临改造和重组,其学术定位和学科特征还相对模糊,及至 20 世纪后半期,现代中国史学才基本成型,与今人心目中的“史学”相吻合。

三、本书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细致地反映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概貌。本书取材力求广博,基本涵盖百年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展现其整体学术面目,同时也有所倾斜和侧重,凸显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尤其关注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重要成就。

四、本书文献与记事并重,前 50 年侧重文献,后 50 年突出记事,大体包括下列内容:

1. 与史学有关的国内国际政治、思想、文化大事;
2. 重要史学主张和史学思想的提出、重要史学论争与事件、史学理论的建构、历史文献的发现与整理、重要考古活动、史学社群的活动、中外史学交流、历史教育等;
3. 史家生平经历、学术交游及行止;
4. 史学及与史学相关报刊之动向;
5. 刊行的主要著作(包括译著)、文集及报告;
6. 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或社会影响的论文;
7. 波及全局的学术思想事件。

五、本书力图在体例上作若干探索,以年代和时间为主线,同时吸收整合学案体和纪传体的优长之处,尝试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学案、专题研究诸体冶为一炉。

六、本书纪时,采用公历,个别地方注明旧历或民国年号。本书正文按年、月、日次序编排。凡无日可考者系月,标明月份或称“是月”;无月可考者系年,标明“是年”。

七、本书各条目,一般包括标题和内容两部分,标题均以黑体标示,内容为对标题的进一步介绍和说明。基于对问题重要性的判断,有的条目仅有标题而未作内容上的说明。

八、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港台史学,暂未网罗。

九、本书以原始资料为主,同时参考利用了相关研究成果,囿于篇幅和体例,恕未能一一详注。

目 录

1900 年 / 1	1901 年 / 7	1902 年 / 19
1903 年 / 43	1904 年 / 66	1905 年 / 82
1906 年 / 99	1907 年 / 110	1908 年 / 120
1909 年 / 130	1910 年 / 139	1911 年 / 149
1912 年 / 157	1913 年 / 167	1914 年 / 177
1915 年 / 186	1916 年 / 197	1917 年 / 207
1918 年 / 219	1919 年 / 227	1920 年 / 242
1921 年 / 257	1922 年 / 268	1923 年 / 289
1924 年 / 317	1925 年 / 334	1926 年 / 353
1927 年 / 372	1928 年 / 391	1929 年 / 423
1930 年 / 456	1931 年 / 489	1932 年 / 521
1933 年 / 551	1934 年 / 590	1935 年 / 634
1936 年 / 682	1937 年 / 731	1938 年 / 762
1939 年 / 777	1940 年 / 797	1941 年 / 820
1942 年 / 849	1943 年 / 863	1944 年 / 883
1945 年 / 903	1946 年 / 917	1947 年 / 934
1948 年 / 954	1949 年 / 974	后记 / 993

1900 年

- ※ 章太炎《馗书》成稿。
- ※ 敦煌遗书发现。
- ※ 斯坦因开始发掘古于阗遗址。
- ※ 王先谦《汉书补注》刊刻。

1 月

章太炎《馗书》成稿。

此书是章太炎早期关于政治、学术（包括史学）方面的代表作。最早的一篇《明独》始撰于1894年9月，最晚的《帝韩》完稿时间为1900年初。此书共五十篇，首《尊荀》，终《独圣》。其中《原人》、《序种性》、《原变》等篇用进化论解释中国历史，考察了人类的原始状态、古代华夏族的形成史及古代胡汉姓氏的同化史，内含不少卓见。

夏秋间，《馗书》刊印补佚本，加入《辨氏》、《学隐》二篇。补佚本显示了章氏思想立场的转变。

2 月

14 日 慈禧下令各地缉拿康梁，并严惩购阅康梁所办报章者。

谕令称“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虽迭经谕令缉拿，但“迄今尚未弋获”，对于康梁所办报馆，如有购阅康梁所办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以“使购阅无人”，康梁“自无所施其伎俩”。

是月 法国人伯希和赴华进行第一次学术考察。

伯希和抵达北京后，适逢庚子事变，应征保卫法国公使馆。1901年伯希和返回西贡后，旋即受命再次赴华考察，该年3月至6月的第二次学术考察，带回大量汉、藏、蒙古文书籍及文物。1902年5月至10月，伯希和再度赴华考察，带回24000余册文献及大量文物。法国科学院院士路易·勒奴在《伯希和的传奇学术生涯》一文中指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

汉籍特藏本是从零开始，而从现在起却可能是在中国和日本域外所存在的最大规模的特藏了”。

3 月

21 日 《清议报》第 39 册刊载（日）有贺长雄《第十九世纪外交一览》。

第 40、41 册连载。

是月 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沙漠发现楼兰古城。

据斯文·赫定撰写的《我的探险生涯》一书记载，该年 3 月 5 日，斯文·赫定带领探险队离开设在中亚的营地，前往塔里木盆地考察。3 月 28 日斯文·赫定等人发现楼兰遗址，但并未引起高度重视。29 日，由于铲子丢失在 28 日的营地，斯文·赫定派人回到 28 日营地寻找铲子，意外发现一些“艺术气息浓厚的木刻”，但是由于饮水出现困难，斯文·赫定被迫撤出，决定第二年再来发掘遗址。

4 月

20 日 《清议报》第 42 册刊载（日）佐藤弘《俄国侵略中国志略》。

第 43 册连载。

5 月

19 日 《清议报》第 45 册在“本馆论说”栏目刊载《埃及近世史叙》。

是月 崖州设志局修纂《崖州志》。

该志共 22 卷，第二年冬纂成，1908 年增订，因经费缺乏一直未能刊印，1914 年地方士绅筹资交由广州天成书局印刷出版。1962 年，郭沫若重游崖县，将此志点校重印。郭沫若称其“于疆土沿革，气候潮汐，风土人物，纂集颇详，颇有史料价值，在地方志书中尚属佳制”。

6 月

7 日 《清议报》第 47 册刊载（日）有贺长雄撰、璵斋主人译《社会进化论》。

第 48、51、52、55—57、61—63、70 册连载。此文传播了社会进化

论观念、人类社会进化形式及中国人种西来说等，对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确立有重要影响。有研究者认为“璚斋主人”即康氏弟子麦仲华。

22 日 敦煌遗书发现。

道士王圆箓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第 16 窟甬道北壁发现一个复洞（现编号第 17 窟），洞内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逾五万件，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摺本、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主要是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所涉年代，自北魏至宋初约七八百年之久；其内容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全部，其中尤以经卷为大宗。

敦煌遗书对研究魏晋至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宝贵的资料价值。不论从数量还是从内容看，敦煌遗书的出土都可谓 20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之一。

27 日 《清议报》第 49 册刊载（日）柴四郎撰、璚斋主人译《埃及近世史》。

第 50—61、64—74 册连载。此文是晚清编译的亡国史中较早的一种，对晚清以后的民族主义、改良和革命思想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该文后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署麦鼎华译。《新民丛报》多次介绍此书，1902 年第 6 号介绍该书时说“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虽然，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1902 年第 9 号该书广告又说“埃及文明开化最古之邦，今几不国矣。观其近世国权所以外流，实有足令吾华人猛醒者。我国民当人置一册，以作前车之鉴”。柴四郎撰写的《埃及近世史》另有章起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03 年出版。1903 年 4 月 16 日起，《童子世界》第 11、13、15、22、23、25、26、30、31 号还连载叶锦清译撰的此书。

受当时国势衰微刺激，译写亡国史一时成风，仅 1900 年至 1911 年间出版的亡国史论著多达五十余种。梁启超的系列弱小民族亡国史《波兰灭亡记》、《朝鲜亡国史略》、《越南小志》、《越南亡国史》、《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并吞朝鲜记》，李芝圃的《朝鲜亡国史》、署名“痴庵者”的《越南亡国惨话》、赵仲的《海外血泪书》、高黎贡的《缅甸灭亡小史》、张成清的《缅甸史》等是其中较著名者。

7 月

吴汝纶回直隶深州避乱，设馆修订刊刻《深州风土记》。

吴汝纶在 1871 年（同治十年）就任深州知州后，即“奉檄”修志，此后虽离任但修志工作未曾中断。义和团事起，吴汝纶避地深州，又设馆对《深州风土记》做最后修订，并于同年农历十一月由深州文瑞书院刊刻行世。该志三十九万余言，分为历代疆域、河渠、赋役、学校、金石、人谱等二十一类和叙录一篇。该志条例清晰，考证精详，文辞优美，故吴汝纶以“字字有本，篇篇成文”自许，梁启超也赞其“是颇为可观的专记风土佚闻的专辑”。该志在体例、方法等方面突破前人窠臼，被后人高度肯定。有书无图，是该志较大的缺憾。此志在 1900 年刻印后，于 1909 年、1910 年、1968 年多次重印。

8 月

15 日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携光绪帝出走西安。

27 日 慈禧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

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后，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许景澄以“极谏”之罪被杀，京师大学堂生徒四散，校舍封闭，藏书损失，慈禧乃下令停办，同时同文馆师生亦全体解散。

10 月

12 日 张之洞向慈禧光绪进呈历代史鉴、名臣奏议文集等书十二种，以供慈禧光绪考览古今。

11 月

1 日 郑贯一、冯自由等编撰的《开智录》在日本横滨创刊。

12 月

6 日 《译书汇编》在日本东京创刊。

编辑兼发行人初署“坂崎斌”，第二年起改署“胡英敏”，实系留日学生戡翼翬（元丞）、杨廷栋（翼之）、杨荫杭（补孙）、雷奋（继兴）等主持。该刊被冯自由《革命逸史》称为“留学生界杂志之元祖”，张静庐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称其为“留学界最早出版之月刊”。

创刊号刊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撰写的《近世政治史》（第 2、3、6、8

期连载)、《近世外交史》(第3、5、6、9期连载),酒井熊三郎撰《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第2期连载)等文章。《近世政治史》一文实际只刊载了第一部分《德意志》,对德意志近代的政治、文化、军事及扩张政策等都有所论述;《近世外交史》一文对拿破仑战争及其意义、维也纳会议召开的情况及取得的成果、维也纳会议之后的世界外交等情况进行介绍梳理;《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一文从“拿破仑一世之败亡”入手,对维也纳会议、维也纳会议后之欧洲、欧洲的政党、欧洲的革命运动等19世纪欧洲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作了介绍。

这些文章的译介刊布,对新史学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日 英国人斯坦因开始发掘古于阗遗址。

该年5月31日,斯坦因率领中亚考古队从克什米尔出发,开始第一次中亚探险考古,并于6月29日进入中国境内。斯坦因此次探险活动系英属印度政府派遣,目的是经天山南路到和田等地进行调查发掘。7月29日到达喀什,为考古探险做准备;9月11日向和田进发;12月7日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寻找古于阗遗址;12月18日到达遗址。发掘工作从12月19日开始,至1901年1月3日结束,斯坦因共获得了包括汉代文书在内的文物一百多件。

21日 《开智录》“改良”第1期刊载(日)涩江保著、冯自由译述《法国革命史》。

第2—4、6期连载。该文内容仅有“封建时代之法国”、“学者新思想之发达”,以及孟德斯鸠、福禄特尔等人的小传。在《开智录》第一期目录中,该文题名为《法国革命史》,但在正文中题名为《法国革命战史》,后又统一为《法国革命史》。俞旦初认为,该文是中国近代介绍法国革命史的最早著作。此后数年间,由于革命思潮的发展,这部《法国革命史》又有多个译本出现。1903年1月,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天骥的译本《法国革命战史》;1903年4月,商务印书馆又将“中国国民丛书社”翻译的《法国革命战史》作为“战史丛书”第1集第4编出版;1903年5月,文明书局又出版了“人演社社员”翻译的《佛国革命战史》。

同期还刊载了“自强”(郑斯栾)撰写的评论《义和团》。作者指出无论是对义和团仇视,还是对义和团同情,“皆非适论”,义和团是一种中国人“独立之性”的表现。作者认为中国人都应有“义和团之精神”,所以提出“义和团之事可哀,义和团之精神可嘉,义和团之志可悯”的观点。

是年

王先谦《汉书补注》100 卷由虚受堂刊刻。

该书除颜师古注所收二十三家注解外，又广泛征引萧该、刘敞兄弟、顾炎武、王鸣盛、钱大昕兄弟、王念孙父子、周寿昌、俞樾等四十七家著述。该书以常熟毛氏汲古阁本为主，用官刊本校定，不仅对汉史进行诠释、梳理，纠正班固《汉书》的错误，而且又尽力疏通古字古训，使《汉书》中晦涩的篇章变得通顺易解，并对各种制度也加以钩稽贯穿，在参证诸说的基础上，纠正过去诸多误说，抒发自己的心得。此书对推动《汉书》研究作用巨大，亦为后人研究《汉书》提供了方便，被推为汉书研究第一善本。

陈毅赴日本考查教育状况。

奉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武昌两湖书院教习陈毅 1899 年 9 月至 1900 年 3 月赴日考察。期间，他关注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购回东京大学史学会编辑的《史学杂志》，对白鸟库吉所著《阙特勤碑铭考》、《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弱水考》等篇，“深服精博”，并拜访了日本史学会评议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那珂通世，与之会谈数次，推许那珂“识达古今，学贯东西，穷乙部之闾奥，启后学之颢蒙，洵推当代泰斗”。那珂告以日本缺少元代史料，托其访求李文田、沈曾植等校注的《元圣武亲征录》、《双溪醉隐集》、《元秘史注》等书。陈毅归国谒见梁鼎芬、沈曾植，备述那珂学行，二人“俱不胜钦仰，以不获识面为憾”。

徐乃昌刻成《郇斋丛书》。

该丛书共 21 种，46 卷，为清代学者著述稿本及徐乃昌自著书汇集而成，所收著述大半为“乾嘉道咸四朝鸿生巨儒之所著未尽刊布者”，如戴震《经考》、丁晏《易经象考》、任云倬《周易诸卦合象考》、田普光《后汉儒林传补逸》、徐乃昌《后汉儒林传补逸续》等。

《史学报》在温州创办。

据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该报由黄庆澄编纂，木刻本，每月一册，寿昌编书局出版，栏目有中国史、西洋史、日本史、中外政治家言论，自 1902 年第 3 期改名《瓯学报》，内容又增加地理学、哲学、算学等，成为综合性杂志。这可能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史学专业报刊。